

# 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

李 甜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合。但山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强内部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隐龙方氏参与会谱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可以在歙淳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表象下,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知。

**关键词:**旌德;隐龙方氏;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宗族组织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6-0098-07

**Fang's lineage of Yinlong village in Jingde county and the expansion of lineage organizations  
in Huizhou prefectur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 Tian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writing the genealogies and building ancestral hall of associated lineages, the Fang's lineages in Jingde county, which was subject to Ningguo prefecture and near to Huizhou prefecture, completed the lineage integration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sub-lineag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reas resulted in frustration of the lineage integration among Fang's lineages in Jingde county. As a large lineage, the Fang's settled in Yinlong village sought to enhance the lineage integration within its own circle and find out symbolic resources internally. Eventually, Fang's lineage of Yinlong village obtained authorization from Fang's lineages inhabited in southeast area of Huizhou by associating with Fang's lineages in Huizhou as well as occupying a place in the associated genealogy compiled by Fang's lineages in She county and Chun—an county at the Zhenying temple, which also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maining its influence within Fang's lineages in Jingde county. We will acquir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expansion of lineage organizations in Huizhou prefectur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 of Fang's lineage of Yinlong village participating in the associated genealogy of the Fang's lineages in She county and Chun—an county, even though which was behind the scenes of expanding the lineage organizations by the Fang's lineages in these two counties.

**Key words:** Jingde county; Fang's lineage of Yinlong village; Fang's lineages in She county and Chun—an county; associated genealogy compiled at the Zhenying temple; lineage organizations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主题之一<sup>①</sup>。徽州作为宗族制度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宗族制度、宗族结构、社会

<sup>①</sup>最新综述参见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控制、宗族与商业关系等方面,取得不少成果<sup>①</sup>。就徽州方氏而言,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积累,管见所及,唐力行以徽州方氏发展历程为个案,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作了探讨<sup>②</sup>;韩国学者朴元燬研究了柳亭山方氏的宗族联合,依托真应庙会谱分析了歙淳方氏扩大宗族组织的过程,注意到歙县、淳安两地真应庙发展脉络的差异,并对徽商与宗族、市镇与宗族等做过专题考察<sup>③</sup>;方光禄也以歙淳方氏为例,讨论了徽州宗法组织结构<sup>④</sup>。

历史上的徽州与毗邻区域关系密切,人口迁徙相当频繁,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借助乡土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借助微观个案窥探宗族发展的脉络,研究徽州本土与毗邻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关于徽州本土与周遭区域宗族关系的研究,白井佐知子在研究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时,曾简要涉及徽州以外的旌德县汪氏家族<sup>⑤</sup>。朴元燬将歙县和淳安方氏视作研究整体,也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朴氏认为:“乾隆十八年以前方氏宗族组织已由十二派扩大至十八派。后加之六派也与前十二派一样,大体按歙县的地名各取派名。但也有像绩溪城南、绩溪许里派超出歙县地界的派名。柳山方氏的宗族组织终于超越了歙县和淳安县的范畴而扩展到邻近的绩溪县。”<sup>⑥</sup>朴氏曾访问过绩溪许里,但没有田野和文献上的进一步收获<sup>⑦</sup>。因此,关于宗族整合背后的因素,朴氏倾向于将歙淳方氏视作整体,重点考察了歙淳方氏与他姓竞争背后的族姓动机,没有对参与会谱的方氏各支派之动机展开深度分析。笔者认为,关于歙淳方氏宗族组织的地理空间,其实际扩展范围比朴氏估计得要大;参与会谱的方氏各支派之动机,也有必要纳入研究视野。有鉴于此,本文在朴氏研究基础上,尝试以宁国府旌德县的方氏宗族文献为中心,从参与歙淳方氏会谱的隐龙方氏之角度,来探究参与会谱支派的意图,并就毗邻徽州的宗族与徽州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背后所展现的利益动机进行探讨。

## 一、旌德方氏及其宗族整合

旌德方氏由来已久。据方氏谱牒记载,晋代时方法立追随为官的父亲方莧来到宣州,南游龙头山,见此山川秀丽,遂筑室定居,乡人称为方村(位于今旌德县三溪镇)。唐代中期割太平县东乡设旌德县,外迁云襄地方的方德做出让家宅为县治之举,复迁回方村,“是为大宗”<sup>⑧</sup>。此后衍为方盛、方盈、方璇三大派,共尊方德的五世孙方元荡为旌德始祖。

旌德方氏三大派历经千百年发展变迁,形成众多的分支别派,“蔓延散处,若城若乡二十余族矣”<sup>⑨</sup>。如方伯成沿着县城孔道顺流而下十余里定居,衍为板山派<sup>⑩</sup>。方鹏翔以农事开业,传数世而人文蔚起,很快就发展为人

文蔚盛的厚儒派<sup>⑪</sup>。方奇与方新兄弟二人前往龙山下垦荒,消除虎患后定居下来,形成了有东门、西门之分的水西派<sup>⑫</sup>。

旌德方氏各支派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令他们感到忧虑的问题,“特虑世远年湮,容有非类而冒宗,有同宗而秦越视之者”<sup>⑬</sup>。面对宗支散杂和地域竞争的压力,旌德方氏在宗族整合上作出不少努力,尤以实力雄厚的方璇派华坦方氏和方盈派隐龙方氏尚文坊支出力为勤,其努力主要体现在家谱编撰和宗祠兴修两方面。

其一,编撰统宗谱。明代时旌德方氏分别于景泰、成

①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②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韩)朴元燬:《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徽州真应庙之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与宗族组织——以歙县的柳山方氏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明代中期的徽州商人方用彬》,《徽学》第3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方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郑振满、陈春声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以上论文皆收入其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的个案研究》(中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并有修改。

④方光禄:《淳歙方氏宗法组织上层结构浅论》,《徽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⑤(日)白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2期。

⑥⑦(韩)朴元燬:《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的个案研究》,第92、219页。

⑧(清)方学成:《华南先德述·华南方氏先世纪略》,收入《松华馆合集》,乾隆年间松华堂刻本。

⑨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方氏续修家谱叙》,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⑩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伯成公支谱序》。

⑪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1《康熙年厚儒原序》,民国十年木活字本。

⑫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1《康熙年水西西门佛子岭龙山序》。

⑬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玉井派重修世谱序》。

化、嘉靖年间三次修谱,此后久未修谱<sup>①</sup>。清康熙年间,隐龙方氏发起倡修统谱,方氏居旌三十派的代表齐集于旌德县城,在梓山下的隐龙方氏尚文坊支祠设立统局,耗费四年时间修撰成统谱<sup>②</sup>。旌德方氏统宗的决心得到体现,主事者方安国由衷地称颂“且有不忘旧恶气量,乃固请相与修辑”<sup>③</sup>的融洽局面。在修谱过程中,尚文坊支不仅提供了场所,还有士绅方安国、方良珍等人的参与,“首创弘图”<sup>④</sup>,其中“弘图”二字被续谱者改为意义更为明显的“谱事”。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旌德方氏统修宗谱》(以下简称“康熙统谱”)修成。

其二,兴修统宗祠。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祠,对于旌德方氏而言是极大的刺激和示范,“絃公合徽郡而建祀于歙邑,我伯源公尝已出费而奉其祀,已而元荡公之合祠未建,于礼则为缺,于义则未安”<sup>⑤</sup>。对比之下,择通衢胜地修建方氏统宗祠便成为很现实的需求。华坦方氏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商人方普在创建旌德方氏祖庙和整理华坦支派家谱方面出力甚多,未竟之事由其子方廷禄奉遗命完成<sup>⑥</sup>。尚文坊等十八个支派欲为唐代始祖方元荡立祠祭祀,但耗费三十年而未成功,来自华坦方氏的商人方璧,建议选址城东梓山之下,并出资助修,最终在乾隆五年(1740)顺利开工。两年后,旌德方氏统宗祠顺利建成<sup>⑦</sup>。

旌德方氏为维系宗族团结和加强控制,出台了一些鼓励和制约规则,这与徽州宗族内部的控制方式颇为相似<sup>⑧</sup>。康熙统谱刊载了续谱人员的姓名,以激励族人的参与热情,希望能以此感召继起之秀<sup>⑨</sup>。编修者首次议定行派,要求挨次取名,本派若不遵守,罚米五石入众祭祖,以加强宗族制约<sup>⑩</sup>。

自雍正七年(1729)起,旌德方氏开始执行严格的会谱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宗族控制。康熙统谱的卷首几页,残留有十四枚会谱关防,多为红色长条式样,除部分残损外,基本保存了原貌。关防时间涵盖了自雍正七年至咸丰九年之间的130年,折射出会谱的执行力度。首枚关防系雍正七年四月初十日会谱的决议:“每经十年一会,约于三月十五日齐集敦睦堂。如一部不到,公议罚银五两,以为祭祖之资。自会之后,如无此印,即系假谱,检出不用。”此时,方氏统宗祠尚未建成,敦睦堂可能系尚文坊支祠堂。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十三枚会谱关防,包括乾隆四年、乾隆十四年、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四十四年、[残缺]、嘉庆四年(1799)、[残缺]、嘉庆二十四年、道光九年(1829)、道光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最后一枚是太平军扰徽前夕的咸丰九年(1859)。其余的几枚戳记,涉及到宗族会谱的实际制约状况:如其中一枚墨色图记,系对外迁支派屡会不到的处罚决定:“夜字号谱因居宁邑,屡会未到,各谱已注空号。己丑携会,照

例议罚外,又演戏。公议仍作真正宗谱流传。”据康熙《宁国县志》载,旌德方氏后裔方壶隐居宁国瓦陶岭之上,其后代择岭而家,号五岭方氏。后有方泽迁居岭下,遂更其里曰泽夏<sup>⑪</sup>。又华坦方氏有数支迁往旌德,其中有方长尧在宁国县经商<sup>⑫</sup>,可能即是相关支派。

据统计,统宗族谱共76部,内除注销、废讫、被火、空号,实存70部。除未领空号外,家谱在保存过程中可能遭遇水火之灾,这些损耗导致实际持有谱牒数目的减少,而部分持谱族人的生活困窘、假冒宗支和地域竞争的实际需求,又促成私卖家谱的行为屡禁不止,方氏宗族对此有几例处罚案例。在乾隆二十四年会验中,查出玉井派方崇兴所执露字号、通分所执巨字号俱被其子方楷、方一佑私卖掉,遂将方崇兴一支照例逐出,并处以罚银和没收家谱。在嘉庆十四年会验中,又查出村口派方富美私卖出云字号谱四本,考虑到其“孤立一人,立锥无地”,从轻处理,按照处罚方崇兴成例,将之逐出祠堂并注销该谱。在咸丰九年会验中,“查得合同派署字号内有伍、陆、壹拾卷肆本涂改甚多,本不加戳,姑念愚误,从轻议罚”。

尽管会谱活动一直在延续,但旌德方氏续修统宗谱的行为却难以维系。按照康熙年间方中矩的说法:“凡属宗盟,固世远而难稽,涣散而莫统矣。”<sup>⑬</sup>明嘉靖年间修撰统谱以后,直到康熙三十七年才得以续修方氏统谱。根据光绪华坦支谱中“统宗谱牒自康熙三十七年续修,

①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1《原序》、《纂修人名》。

②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方氏续修宗谱序》、《永丰方氏续修谱序》。

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旌德方氏纂修宗谱序》。

④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方氏世谱序》。

⑤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3《满公宗祀合记》。

⑥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1《方君仲周传》。

⑦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方君雪峰公传》,光绪二十六年木活字本。

⑧参见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详见氏著:《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社会控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⑨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2《族谱凡例》。

⑩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3《旌德方氏排行引》。

⑪康熙《宁国县志》卷8《隐逸·理学附》,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⑫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1《方隐君汝大公传》。

⑬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1《康熙年厚儒原序》。

历今百有余载”<sup>①</sup>的记载可推知,康熙统谱是旌德方氏最后的统谱。

考察旌德方氏统谱难以维系的因素,除了实际修撰操作的困难,还在于各支派实力的发生变化,促成支派意识的凸显,从而影响了旌德方氏的整体认同。伴随着明代中后期山区开发进程的加快,各派发展情况出现差异,如隐龙、玉井、尚文坊等支,“特达者非一人,潜修者非一士”<sup>②</sup>,支派发展相当迅速。至康熙年间,旌德方氏三大派之间的实力可谓悬殊。方盛派人口最少,人丁不旺;方盈派人口最多,除占据方氏地望隐龙之外,“延蔓于旌之城坊乡井”<sup>③</sup>,迁入县城的尚文坊支占据了经济和文化优势;方璇派实力在两派之间,其迁外人口占到相当比重,尤以华坦支为典型<sup>④</sup>。方氏各支派中有实力者,各因其居址修葺之便建立分祠,“三派派各立祠,隐龙两祠,玉井一,华坦一,梓山支祠一”,其中华坦属方璇派,隐龙、玉井和梓山(即尚文坊)属方盈派,至少以上四个方氏支派已有相当程度的支派意识。顺治年间建设的隐龙满公分祠堂,其颇费周折的命名过程,展现出更为细致的支派意识:“我族自伯源公始迁隐龙,不曰伯源公何也,以伯源公后调公、萃公分为两村,各有祠也。不曰萃公又何也,以萃公之下、满公之上分支于十五都也。”<sup>⑤</sup>隐龙分建两祠,原因在于其内部又分为上方、下方两支,各以方调、方萃为支祠始祖。

且以华坦方氏作为观察支派意识凸显的例子。康熙年间,方璇派旅外者,绝大多数属华坦支派,此势在后来得到进一步强化。至光绪年间,方璇派居地一共有23处,其中县内5处系属其他小支;迁往外地者皆为华坦支。其中迁省内8处,分布于宣城、繁昌、六安、宁国等地;迁省外10处,分布于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省<sup>⑥</sup>。华坦方氏在明代“未尝有招游城市、轻谒官府者”<sup>⑦</sup>,尚未养成经商风气。清初以来,旅外经商者渐多。方懋学“弃业就贾,而家道鼎盛,阡陌堂构,焕然一新”<sup>⑧</sup>,给族人树立良好的经商典范。方懋学之子方振元读书不成,也步其父后尘<sup>⑨</sup>。方蛟在浙江桐乡贸易,为迎合地方人士,创建了宣桐义园<sup>⑩</sup>。方长尧弃儒就贾,在宁国县经商,同样获得了士人认同,与宣城名士施闰章交好<sup>⑪</sup>。由此可见,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支派宗祠的建设;而旌德方氏统宗谱难以为继,又给华坦方氏支派意识的崛起创造了契机。元代方惟昌作为华坦方氏的发祥之祖,其墓地被当作凝聚支派意识的场所,“先生后裔思先生之德勿衰,复建支祠以祀先生”。经过一系列努力,华坦方氏形成了“合建宗祠,因输田以为寝室,而方氏族日益昌”的良性局面<sup>⑫</sup>。商人方懋学的孙子方璧,在康熙三十年于村西建造宗祠的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sup>⑬</sup>。乾隆年间的方学成,参与修撰过乾隆《宁国府志》,在其著作中

万方数据

收录《华南先德述》<sup>⑭</sup>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华坦方氏的历史渊源。道光华坦支谱的修撰,是华坦方氏支派意识形成的标志,“故从前方氏宗谱均合旌德方姓为一,华坦之别有谱,倡修于道光初年也”<sup>⑮</sup>。在光绪谱中,华坦方氏对旌德方氏统宗谱难以为续的现状感到失望,希望通过增修女行次的方式,来加强其支派内部的整合<sup>⑯</sup>。依此类推,旌德方氏其他支派大多如此。

由此可见,地域竞争的压力和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祠的示范效应,刺激了旌德方氏的统宗需求。在实力支派的支持下,通过康熙年间重修家谱和乾隆年间兴建统宗祠来整合宗族,雍正年间确立十年会谱一次的规定也得到严格遵循,一直坚持到太平天国战乱到来为止。但随着旌德方氏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成支派意识的凸显,加上统谱难以维系,又影响了方氏宗族的整体认同感。宗族整合的聚合性和支派意识的离散性,两种力量在消长中达到有机平衡。

## 二、隐龙方氏及其内部整合

据隐龙方氏谱载,宋嘉祐年间,方盈派后裔方伯源从咸阳县卸任归里,遨游山水,遍观名胜,游览至县城南边十五里一处地方,见其山环水绕,宛如桃源仙境,遂决意

①⑬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首《旌德方氏排行》。

②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旌德永丰方氏族谱原序》。

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方氏世谱序》。

④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3《历代居址地名》。

⑤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3《满公分祠堂》。

⑥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迁派·方璇派居址地名》。

⑦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明处士方龙兴传》。

⑧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华峰孟生方夫子序》。

⑨⑬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方君雪峰公传》。

⑩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方君邗川公传》。

⑪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11《方隐君汝大公传》。

⑫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末《梅象方先生传》。

⑭(清)方学成:《华南先德述·华南方氏先世纪略》,收入《松华馆合集》。

⑮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首《华坦方氏新修谱序》。

定居于此,“以其山势委蛇盘屈,有潜隐之意,故名曰隐龙,是为隐龙肇基之始祖”<sup>①</sup>。隐龙方氏自此得名,并成为旌德方氏众多支派的大宗。

作为大宗的隐龙方氏,要确保在旌德方氏众多支派中的优势地位,首先面临的是支派内部的整合要求。隐龙支派的分支可谓复杂,根据家乘记载,方伯源隐居隐龙后,分为上方和下方两村,其子孙“为宦留家,因贾迁地,随赘改居,转徙不一”,相继形成了十多个分支<sup>②</sup>。宋元间方伯富自隐龙外赘,后移居形成板桥支<sup>③</sup>。厚儒支的始祖方伯玉系方伯源之弟,据隐龙本村人称:“故其族户口之繁、人物之盛,与吾隐龙相埒。”<sup>④</sup>可见该支历史悠久和实力雄厚。明代方原真迁县城后形成隐梅支,其后裔方友庆再迁形成尚文坊支<sup>⑤</sup>。藁口派支分出泾县尚泽支,其裔方孟孙自元季迁居俞村后形成俞村支,该支于民国年间加入隐龙合谱。俞村支又因生齿日繁,分徙形成九处村落,其中方子禄迁居黄田形成黄田支<sup>⑥</sup>。基村支也是因为基址湫隘,发展的空间有限,先后迁徙形成多处散支,“有七里坦、犁壁石、八角亭、前场坦、沙堤、江村之迁,且有泾县官圩、百户、太平尧村之徙,甚且有广东惠州卫军户之派”<sup>⑦</sup>,分布范围非常广。由此可见,隐龙方氏的支派繁衍远比旌德方氏其他支派更为复杂。

隐龙方氏内部各分支的关系,亦随着实力消长而发生变化,其中隐龙本村并非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按照尚文坊支的说法,宋元间悉以隐龙方氏冠名,迁居县城之后,其后裔占据经济和文化优势,在修谱中担负重要功能,逐渐改变隐龙本村一支独大的局面。如始迁县城的方原真,其子方让在明代正统年间会集诸派修理家乘,为旌德方氏的宗族整合发挥了巨大作用<sup>⑧</sup>。厚儒支与隐龙本村实力相当,乾隆间重修隐龙支谱,即有董事在局之士<sup>⑨</sup>。俞村支在未加入隐龙会谱之前,于乾隆年间建造了自己的支祠<sup>⑩</sup>。隐龙本村虽人口众多,但以务农为主,在明代和清初的旌德方氏统宗修谱活动中并不占优势。清初以降,因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人口增殖的压力,“吾村田少,所以群趋工贾”,隐龙本村开始养成经商业贾的风气,至乾嘉年间已成规模。如方俊的长兄创业于县城东,二兄设肆里中,其本人携堂弟往外经商,“上至吴城、汉口,下至芜湖、湾沚,广设市场,盛名愈盛”<sup>⑪</sup>,一家三兄弟皆在商界崭露头角。方维翰家中清寒,无力读书,十一岁时被父亲带到广德州经商,三年后父亲去世,“年才十三岁耳,而经营调剂有老成风”<sup>⑫</sup>,颇有经商的天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与之相应的是文化的兴起,自乾隆四十年(1775)文会兴起后,文教方面渐有突破,逐渐改变了业儒者“未免为樵夫所笑”<sup>⑬</sup>的尴尬局面。

隐龙各支实力消长这一现实因素,影响了隐龙方氏统宗的实际操作。就丁口而言,道光年间一则官方告示

说明:“隐龙原属老家,近而九柱人多,远而七支丁盛,因兴谱牒以别亲疏。”民国年间官方告示依然作如此强调<sup>⑭</sup>。由此可见,隐龙方氏不仅支派众多,且各支的人口有较大差异。根据民国《隐龙方氏宗谱》(以下简称“民国支谱”)中所载历次修谱的纂修人名和家谱分配数量,可以探究各支的人口变化和宗族活动的参与程度。谨将催交人员的支派分布列下:“嘉靖统谱无此项;康熙统谱催交:隐龙、厚儒、基村、石坦、水西、藁口、前山;乾隆支谱催交首事:隐龙、厚儒、基村、石坦、水西、龙山、前山、湾里;咸丰支谱催交:隐龙、基村、石坦、水西、龙山、前山、湾里、厚儒;民国支谱催交:一甲、三甲、四甲、五甲、七甲、八甲(以上属隐龙本村)、厚儒、基村、湾里、俞村、前山、石坦、水西、龙山。”根据出现的名次和顺序,可见康乾年间各支变化不大,咸丰年间已有一些变化,较大的变化发生在清末太平天国战乱之后,隐龙方氏整体实力虽然衰减,但形成隐龙本村一支独大的局面。参与修谱的支派中,基村、石坦、水西、前山等支较为稳定,厚儒支的流动性较大,俞村支直到民国支谱中才加入。至于迁入县城的尚文坊支,该支实力雄厚,清初即拥有梓山支祠,颇有与隐龙本村分庭抗礼之势,没有在历次隐龙方氏会谱活动中发挥作用。民国支谱一共印刷 38 部,领谱字号的分配比例可以部分地反映各支的实力对比和参与力度。除叙伦堂收存一部外,其余 37 部在各支的分配如下:一甲 4 部、四甲 5 部、五甲 2 部、七甲 12 部、三甲 1 部、外土库 2 部、八甲 1 部、厚儒 1 部、基村 2 部、石坦 1 部、龙山 1 部、前山 1 部、俞村 4 部。隐龙本村以拥有 27 部占据绝对份额,但隐龙本村有上方、下方之别,且各甲所领家谱的数

①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4《始祖世系》。

②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1《迁徙》。

③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1《上泾板桥派修谱原叙》。

④⑨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20《平甫方明经传》。

⑤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6《尚文派·友庆公迁梓山尚文坊记》。

⑥民国《隐龙方氏宗谱》第 2 册《俞村支派·家庙图》。

⑦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1《康熙年基村原序》。

⑧康熙《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1《邻水侯传》、卷 6《尚文派·明处士方友庆公迁尚文坊基址志》。

⑩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19《俞村派附修序》。

⑪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20《芝田公传》。

⑫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20《胜泉公传》。

⑬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1《家规》。

⑭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1《告示》、《新告示》。

量相差甚大,可见其内部亦出现不平衡的状况。

太平天国战乱后,隐龙方氏的宗族重建活动受到影响,遭遇了资料缺乏、经费困难、人才难觅等三大困难<sup>①</sup>。隐龙上村原在宣城的试寓得到重建,但位于旌德县城的试寓却未能复造。隐龙支派宗祠在战乱中遭焚毁,仅于同治九年(1870)造享堂一楹,前中两进却未能规复<sup>②</sup>。直到民国十年,隐龙方氏才完成重修支谱的事业,并照旧例规定了会谱制度:“仍照甲巳年冬至后十日为准,内外各派领谱者,届期咸集隐龙叙伦堂公同检核,虔诚设祭,如有不到者,亦照旧例罚银五两入会,谱众仍追谱牒会核。”<sup>③</sup>由此可见,以隐龙本村为大宗的隐龙方氏,于民国初年重新完成了内部整合。

### 三、隐龙方氏与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

作为大宗的隐龙方氏,要确保在旌德方氏众多支派中的优势地位,除了要面临支派内部整合的要求,更面临着支派之间的竞争。本节试分析隐龙方氏如何在旌德方氏的支派竞争中维持优势地位。

对比旌德方氏现存家谱可以发现,属于隐龙方氏的民国支谱对一世祖的追溯发生变化,世系序列的数字大大缩水,这与康熙统谱有所不同。隐龙方氏在民国支谱中放弃方雷而选择方储<sup>④</sup>作为一世祖,应与近世以来方储作为东南方氏宗族乃至区域性神灵的功能勃兴有关,其中牵涉了徽州宗族竞争的时代大背景。

根据朴元燊的研究,徽州方氏面对不断强化的地域竞争,发起柳亭山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活动,吸引了以歙县、淳安两县为主体的众多方氏支派参与进来,并将影响波及到徽州边缘区域。朴氏认为,“方善祖并且引征《礼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来阐明编纂统宗谱的目的在于‘收族’。即以扩大宗族组织为首要目的。虽然对广散江南的方储后裔进行‘收族’不大可能,但先以歙县为中心与邻近的淳安县方氏结成柳山方氏,此后又将宗族组织扩大到另一相邻的绩溪县。”<sup>⑤</sup>但翻看乾隆十八年(1753)修撰的歙淳方氏统谱可见,徽州之外的旌德隐龙方氏赫然在目,可见其辐射范围显然比朴氏估计得还要大一些。

关于隐龙方氏参与歙淳方氏会谱的时间,按照方象瑛的说法,可能在康熙九年(1670)就已经开始参与:“至今柳亭山真应庙灵爽式凭,凡承祀苗裔,或处江浙,或处宣歙,合有二十五家,载在谱书,班班可考,而旌阳隐龙并列其中。”<sup>⑥</sup>该跋没有收入康熙统谱,推测旌德方氏各支派中只有隐龙方氏参与了歙淳方氏会谱,可见隐龙方氏的支派意识觉醒得相对较早。

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号称考证严密,参考44种文献<sup>⑦</sup>。撰谱者对各参与会谱支派进行严

格考据,对于未便确认者,单独列入《谱外宗支》,附于卷末。至于歙西方村派,虽然曾赴工与祭,并有主拊祀真应庙,但确定并非本宗之后,直接予以摒除,仅在《附考》中略为提及,以备稽查<sup>⑧</sup>。

在此次会谱活动中,隐龙方氏总祠叙伦堂和支祠继述堂、一经堂,一共获得三部铃印宗谱,占总数的1/20<sup>⑨</sup>。隐龙方氏攀附歙淳方氏大族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考察隐龙方氏能顺利通过稽查的原因,至少有两点:

其一,会谱编撰者应该很清楚,所谓洪武四年(1371)《真应祠宗支合同》记载的方氏分支,除部分可考外,大多因历年既远,传写失真,无法考证明白,迁往旌德隐龙的俊公派等几支甚至“多不符合,而讹误之由莫考”<sup>⑩</sup>。但毕竟此合同系较为权威的文献,不可置之不论。根据利益考虑,也很难拒绝宗族组织扩大的现实诱惑,这在族谱中有着刻骨的解说:“收族归宗,实有重于追源溯本。”<sup>⑪</sup>根据真应庙会谱记录,会谱者最终还是接受了参会支派频繁变动的现实,以洪武合同记载为参考凭据,对包括隐龙方氏在内的一些世系莫考者予以接纳。

其二,隐龙方氏族人在歙淳方氏统谱修撰中发挥了相当作用。方逢城,世居隐龙村,“业劂劂,精于钩剔”<sup>⑫</sup>,是著名的旌德刻工。乾隆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开雕时,方逢城即赶来参加镌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压轴的《谱成告庙文》后特别标注“黟侯五十九世孙旌德隐

①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1《续修新谱序》。

②民国《隐龙方氏宗谱》第2册《隐龙基图·本邑屋基》。

③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20《领谱字号》。

④(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朱万曙等校点:《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98—100页。

⑤(韩)朴元燊:《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县方氏的个案研究》,第93页。

⑥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20《原跋》。

⑦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弁首《考证诸书》,乾隆十八年刻本。

⑧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0《谱外宗支附考》。

⑨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20《领谱总号》。

⑩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18《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

⑪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18《柳山十大派考》。

⑫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19《宗人德生君传》。该传又收于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20。

龙逢城雕本”<sup>①</sup>的字样。会谱中除收录其父方芝的传记,还有同属隐龙方氏的方正表和方观颜两位族人的传记<sup>②</sup>。

由于方氏各派的始迁祖参差不同<sup>③</sup>,按照乾隆真应庙会谱的规定:“旧谱悉以絃公过江东为一世,今谱名曰真应庙会谱,故始储公称一世。”<sup>④</sup>改立方储为一世祖,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细化阖族秩序,以增强歙淳方氏联宗的凝聚力<sup>⑤</sup>。隐龙方氏被视作洪武四年宗支合同的正统代表,相当积极地回应了会谱要求。在民国支谱中可以看到,新修隐龙支谱参考了真应庙会谱的样式,很有技巧地放弃始祖方雷,将之置入《原始世系》,并没有武断删除;另立《始祖世系》,转奉方储为正朔<sup>⑥</sup>。在隐龙本村设立的真应祠,直到民国年间尚设有专门的香灯世仆负责看守<sup>⑦</sup>。值得一提的是,隐龙方氏在努力追求东南方氏群体认同的时候,却与血缘更为亲近的旌德其他方氏支派在始祖追溯方面渐行渐远<sup>⑧</sup>。

在嘉靖谱序中,隐龙族人方文易对东南诸方氏的源流有所概括:“江南之方,大抵皆宗絃也。而宛陵之人多以竟为主者,以其守于宣耳。自宣而旌莫不以元荡为宗,盖以元荡居于旌、墓于旌、子孙繁衍于旌故也。纷纭旁午,祖述不一,迨细稽之,皆本之一人而已。”<sup>⑨</sup>在方文易看来,江南方氏、宣州方氏与旌德方氏在世系追溯上的差异,其实并非宗族联合的障碍,同宗共族的集体认同和现实利益的引导,才是隐龙方氏与徽州方氏寻求联宗的驱动因素。同理,旌德方氏各支派的统宗行为,也是出于相似的考虑。

明末清初以来旌德方氏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使隐龙方氏寻求新的象征资源,以便维系大宗的地位和影响力。隐龙方氏选择参与歙淳方氏会谱,在世系上做了调整,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这对于提升隐龙方氏在方氏族内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扩大旌德方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 四、结论

地域竞争的压力和歙淳方氏合修柳山真应庙统宗祠的示范效应,刺激了宁国府旌德县方氏宗族的统宗需求。在方璇派华坦方氏和方盈派隐龙方氏尚文坊支等实力支派的支持下,通过康熙年间重修家谱和乾隆年间兴建统宗祠来整合宗族。为维系宗族团结和加强控制,出台了一些鼓励和制约规则,雍正年间确立的十年会谱一次的规定得到严格遵循,直至太平天国战乱到来时才终止。但伴随着山区开发的进程,各派发展情况出现差异,促成支派意识凸显,反过来影响旌德方氏的整体认同,使得旌德方氏重修统宗谱的行为却难以维系。

作为大宗的隐龙方氏,要确保在旌德方氏众多支派

中的优势地位,首先面临的是支派内部的整合要求。隐龙方氏内部各分支的关系,随着实力消长而发生变化,隐龙本村并非总是占据优势地位。经过一系列宗族整合,至民国初年,隐龙本村重新获得对隐龙方氏的主导权。此外,隐龙方氏还面临着支派间的竞争。明末清初以来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促使隐龙方氏寻求新的象征资源,以维系大宗的地位和影响力。隐龙方氏选择加入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利用洪武四年《真应祠宗支合同》的文献记载和隐龙族人在真应庙会谱修撰中发挥的作用,顺利地通过稽查,在歙淳方氏会谱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

隐龙方氏与徽州方氏发生联宗,对于歙淳方氏而言,是将其宗族组织扩展到范围更大的区域,扩大了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的地区影响力;对于隐龙方氏而言,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有利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大宗地位,也提升了方氏宗族在旌德地方的影响力。从隐龙方氏的角度来分析加入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的背景因素,可以观察参与歙淳方氏会谱各支派的内部差异性,以及毗邻徽州的宗族与徽州宗族在会谱活动中所展现的利益动机,从而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研究》(07CZS009)和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清末徽州教育研究》(2010SK045ZD)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 甜(1985—),男,安徽广德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 瑞

①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20《谱成告庙文》。

②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19《见池方公传》、《城山方君传》。

③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18《纶序世次总目》。

④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1《凡例》。

⑤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 1《正误》。

⑥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3《世系》。

⑦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20《家仆姓名》。

⑧如华坦方氏奉方叔为始祖,并在世系上与隐龙方氏多有龃龉。参见光绪《旌阳华坦方氏宗谱》卷 1《华坦方氏历代统宗世系图纪》。

⑨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1《嘉靖年原序》。